

低“人口素质”与高经济增长*

——基于浙商群体的解释

杨轶清

【内容摘要】浙商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基于相同文化背景的创业群体,浙江省民营经济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一。但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各项指标均排在前十名以外,与浙江经济的活力实力形成鲜明反差,浙商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亦落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文章认为,浙商的“企业家能力”有其特殊的禀赋形态,浙商有着非编码知识优势以及创业知识易流动特征;同时,拥有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强行动力和高效率的小数据决策模式。这些浙商的特征与浙江深厚的地方性工商业知识、集束化的产业分布以及地域文化价值观互为因果激励。不过,浙商低学历创业优势具有阶段匹配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的浙商群体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需要在学习机制、知识结构、决策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机更新。

【关键词】人口素质;浙商;民营企业;企业家禀赋;非编码知识

【作者简介】杨轶清,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现代商贸研究中心副教授。杭州 310012

Low Education and High Economic Performance: A Zhejiang Entrepreneurs Perspective

Yang Yiqing

Abstract: *Zheshang* (Zhejiang Entrepreneurs) is China's most influential business groups based on the sam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Zhejiang's strength of private economy stands at the first place in China. However, *Zhejiangese's* education levels show sharp contrast to the power of Zhejiang's private economy. *Zheshang's* education level falls behind the mean level of the national private business owner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Zheshang's* special endowment forms are the source of their "entrepreneurial capacity", and the non-coding information is also one of the features among *Zheshang*. *Zheshang's* performance is of reciprocal causation with local knowledge traditions,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luster of industries in Zhejiang.

Keywords: Population Quality, *Zheshang*, Private Enterprise, Entrepreneur Endowment, Non-coding knowledge

Author: Yang Yiq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Zhejiang Business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Email: zjyangyiqing@foxmail.com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BGL043)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2YJAZH026)的资助。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到目前为止,浙商^①已经发展成为在全国范围内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分布最广的经营者群体和投资人。据 2007 年浙江省首次发布的《浙江省市场主体信息报告》(浙江省工商局,2007)显示,浙江省平均每万人有市场主体 476 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63 户,市场主体“密度”位居全国第二。此外,浙江省每万人口中个体工商户为 361 户,高于全国 197 户的平均水平,列全国第一。人口占全国 4% 的浙江省私营企业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数的 8.2%,每万人口在册私企 82 户,高出全国平均一倍多,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浙商的规模也在全国领先,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企 500 强排行榜上,浙商连续 16 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 2006 年,浙商更是占据 500 强中的 203 个席位,比例高达 40.6%。与此相对的是,浙江省的人口数量仅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4%,也就是说浙江的民企 500 强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0 倍以上。

上述数据,尚未包括浙商在省外投资创办的企业。浙商也是中国异地(省外)创业规模最大的群体。截止 2010 年,共有 600 多万浙商在全国各地创业,创造的经济总量相当于同期浙江省 GDP 的 80%。也就是浙商在省外又再造了一个“浙江省”。

同浙商强劲的经济实力相比较而言,浙江的“人口素质”与浙江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并不相称:浙江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以及其他反映人口素质的指标都处在全国的中下游水平。与浙江靠前的经济指标位次相比,反差非常大。

根据“四普”、“五普”数据及专家测算,浙江省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全国排 22 位(叶明德、孙胜梅,2004);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密度排序全国第 17 位(叶明德、孙胜梅,2004);而浙江省农村劳动力高中及高中以上比例居全国第 20 位(陈丽华,2000)。与此同时,浙江也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度排名全国倒数第三的“资源小省”。

2010 年“六普”数据表明(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11)浙江省的常住人口中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专及其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为 9330 人,在全国排名第 12 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上的 13562 人,列全国第 16 位,较之十年前的“五普”均有较大幅度上升。但浙江省仍然不属于中国受教育水平最高的 14 个省份之一,却是文盲率比例最高的 8 个省份之一。浙江省文盲率为 5.62%,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 4.08%。根据定性描述:目前浙江省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仍然处于中下水平。

在沿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 5 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省市中,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劣势更为明显(浙江省统计局课题组,2013)。2010 年,浙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19 年,在上述沿海省市中居倒数第一位;文盲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54 个百分点,在这些沿海省市中最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 6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34 个百分点,也在沿海省市中最低。

作为浙江经济主力军的浙商起步于农村,2003 年之前工商联系统组织的多次非公经济人士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以上的浙商出生地为“乡镇及村”。浙江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也落后于其经济地位,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5 年完成的浙江省工商联非公经济人士调查数据显示,在当时浙江私营经济主要指标已经居于全国前列,但浙商的平均学历却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高中为界,浙商低学历段(含文盲、小学、初中、普高和职高)四级学历的比例都比全国的私营企业主的平均水平要高。而浙商的高学历段(含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四级学历都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并且大专以上学历的浙商只占总数的 11.6%,而同口径的全国平均水平为 17.2%,这意味着高学历段浙商仅

^① 本文的“浙商”概念是指从事自主经营活动的法律意义上的资产所有者,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各类股东、合伙人等自然人市场主体。

为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的 2/3。

专家学者们一直认为,在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浙江省,之所以能够创造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靠的是充沛的创业者和企业家资源的供给,即突出的浙商创业能力和他们的创新精神。这里存在的悖论是:为什么受教育程度较低、专业技术人员较少的浙江人,特别是浙商,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了最具活力的创富群体?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与经济增长较快之间的悖论,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浙商群体的结构特征,对低“人口素质”与高经济增长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解释。

2 研究方法

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认为,劳动力质量的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人力资本作为知识和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量的“巴罗”式的增长回归分析说明(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2000):一个国家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入学率,人均GDP也相应地增加1~3个百分点;而每增加1年的受教育年限,经济增长速度也增加1个百分点(陈秀山、张若,2006)。本文作者对中国2010年各省市区的数据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以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的全国各省市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每10万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与2010年对应的各省市人均GDP排序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存在显著正向相关性。各省市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22。尽管如此,两者的对比关系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例外。在全国31个省市中,两者排名落差达到10个位次以上的有5个省区。反差最大的分别是广东和安徽,前者经济指标显著高于人口平均受教育指标达13位;而后者正相反:安徽省人口平均受教育指标排名全国第6位,而人均GDP排序为全国第26,相差20位。

如果只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对比相邻的浙江省和安徽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安徽高于浙江,但浙江省的人均GDP是安徽省的2.5倍。经济人的行为有生理天赋以及理念和行为习惯两个层面。一般认为,生理天赋表现为智商,而理念和行为习惯在经济领域可以称之为财商。处于不同地域的人们,他们的社会价值观或财富观(包括与之对应的理念和行为习惯)会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之所以浙江省的经济增长较快,从人口禀赋来说,可能是理念认知和行为习惯即财商的存量和结构存在优势差异。

本文对浙商群体的分析,将基于作者对浙商群体的定性调查,阐述知识结构、受教育程度与创业能力(宏观表现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教育程度主要测量编码知识的多寡;而浙江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80%以上为家族或单一自然人,即个人承担决策职能。决策行为主要依赖结构化程度不高的非编码知识,即经验直觉等隐性知识。浙江省拥有存量丰富的工商业地方性知识优势,以及重商的文化价值观和企业家精神,契合创业者人格结构,因而创业绩效较高。

3 对浙商低学历与经济高增长的理论解释

3.1 浙商知识结构契合企业家典型特征

作为一种特定的职业,企业家与艺术家、科学家等职业一样需要专用的自然禀赋,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认为企业家是“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是对生产要素进行创造性组合,其实质是“创造性破坏”,他也认为企业家能力来自先天禀赋。而舒尔茨(T. W. Schultz)率先提出了企业家的“异质性”概念(周文斌,2007)。企业家作为“专用人力资本”的主体,其素质、能力的内涵和定义以及这些素质能力的来源和生成机制,与根据国民教育指标作为评价体系的通用人力资本,具有显著差异。

奈特(Frank Knight)相信企业是这样的一个组织——通过“自信或勇于冒险者承担风险,并保证犹豫不决者或怯懦者能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企业家能力的差异,就取决于对风险,即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对因果不确定性的把握和行动能力(林祥,2002)。

在泰勒理论和智商学说受到质疑之后,麦克莱兰(D. C. McClelland)发现,通常人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智商、技能或经验等,并非影响个人绩效的根本因素。他在《测量资质而非智力》文章中指出,决定个人绩效的是诸如“成就动机”、“人际理解”、“团队影响力”等一些可被称为资质的东西。

国内学者对企业家禀赋的研究发现,华人企业家能力结构及其特征与欧美并无实质差异。李志、郎福臣、张光富(2003)对47篇论文涉及的80种企业家能力进行了合并归纳后发现,包括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与自然人个性相关的指标达到70%以上,这些个性类指标与受教育程度无直接关系或关系不大。

可见,企业家能力和知识属性具有特殊性。知识可以分为诀窍和信息两种类型,诀窍是指无法编码传播的信息,它是一种实践技能或专用知识的积累;信息则是在传播过程中完整性不受损的知识。诀窍类知识与企业家禀赋的兼容性较强,而浙商的诀窍类知识水平较高。

浙江省“艺商”传统即民间手工业传统历史悠久。这些传统工商业的地方性知识属于默会知识,这些知识形态主要表现为非编码知识,比如祖传手艺、商业习俗、生意经、共同的产业选择等(陈立旭,2005)。我们经常说义乌人“天生会做生意”,永康人“天生会做五金”。在较大的地理范围内规模很大的人群呈现出这样一个共同的特征,得益于地方性知识即诀窍类知识的存量储备丰富。这种知识的学习和传播属于“无字学习”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路径。这些知识的流动和共享弥补了浙江人接受正规国民教育程度偏低的劣势,提高了创业成功率。

3.2 低学历与民营企业个人化决策的一致性

决策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大脑神经的活动过程。因为人类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个体自身的局限性。大多数民营企业主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时,不习惯也没有能力理解和应用复杂的决策工具,个人或个别人承担最终决策时尤其如此。当决策时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大于决策者个体自身所能处理的上限时,决策者通常不会理性地利用概率和统计规则去评价和判断不确定事件,也不是根据预期效用函数作决策(陈春霞,2008),在决策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选择捷径或带有偏见地去选择。

与国有企业或西方典型的“董事会+经理人”控制的大公司相比,浙商的控制权和决策权高度集中于实际控制人。而终极所有人或实际控制人,大多是单一自然人或家族。

即使是上规模和治理较为规范的民营上市公司,也是如此。观察注册地在浙江的147家民营控股上市公司(2008)发现,浙江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平均值为44.61%,高于沪市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平均值(杨轶清,2014)。实际控制人为家族或单一自然人的,在所有147家浙江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中占比83%,占据绝对多数。

2014年底和2015年初,我们对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杭州市衢州商会、丽水商会等近三百位民营企业家的“民营企业决策模式”问卷调查显示,“有集体决策的形式和流程,实际是董事长个人拍板”和“集体决策的形式都没有,就是老板说了算”的超过调查对象的70%。中小或小微企业,因为人才存量的制约以及公司治理体系的不完善,无论形式还是实际均是典型的个人决策。因此,浙江民营企业绝大多数由家族或单一自然人控制,董事长总经理一体,控股权、决策权及执行权三权合一,具有强烈的个人化特征。

个人决策实质是直感决策(intuitive decision-making),以直觉判断为主的直感决策是浙商决策的主导模式。直观推断和偏见构成了复杂环境的简化机制。直感决策根植于决策主体的经验,而非源自对外部信息的搜集(柏菊,2008),因此隐性知识在直感决策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些隐性知识的筹集主要不是来源于学历教育等国民教育体系的编码知识学习,而是属于眼光、魄力、经验、判断力等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范畴。

直感决策实质是小数据决策(基于私人信息和有限信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浙商,隐性知识的积累较多,在其知识总量中占比较高。所以其知识筹集成本低而决策效率高,商机识别和转化迅速。特别是创业初期阶段,存量资源有限,小数据直感决策成本低效率高,更具比较优势。

3.3 低学历与创业能力的兼容性

创业从成功率上说属于“概率性事件”,创业过程是事前不可知和无法度量的,因为结果无法预期和锁定,企业家要有对不确定性的把握能力和风险的承受能力。所以企业家报酬就是通过对不确定的把握获得的一种“不确定性剩余”。企业家的核心禀赋就是敢于行动,这也是企业家区别于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特征。

研究发现,企业家理性程度显著低于专业技术人员,尤其是第一代的创业型企业家。而浙商群体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区别正是在于受教育水平和编码知识的多寡,编码知识较少和理性信息不足的浙商更敢于挑战不确定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浙商行动力更积极主动,以“行易知难”的执行观,弥补要素存量的劣势乃至错误决策的损失(杨轶清,2009)。通过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快速“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创业环境不佳需要勇气冒险的早期阶段,浙商的这一禀赋特征优势更为明显。

草根起步的浙商在创业初期,除了企业家精神,其他资源要素往往一无所有。这是典型的在资源匮乏环境下的机会识别和兑现过程。与其他省市的企业家相比,浙商的冒险偏好更为突出(杨轶清,2009)。特别是早期创业的浙商,其行为风格符合小数定律即“彩票现象——低估中高概率,高估极小概率”。这种行为模式是浙商大面积生成的逻辑前提,而浙江务实、事功、重商的历史文化传统又为之创造了社会土壤。一方面浙江的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生存压力大,因此进入工商业的机会成本低;另一方面地域文化价值观对自主创业的激励和对失败的宽容。这样的价值观和思维行为特征,促进了大量浙江人潜在企业家禀赋的外化和显化。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浙江人口,尤其是浙商群体结构中的特殊性:异质性人力资本即企业家资源在人口总量中占比较高、数量较多;工商业地方性知识即非编码知识、隐性知识在知识总量中占比较高、存量丰富;重商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即企业家精神突出。浙江人口的这些特征降低了对编码知识即受教育水平的依赖。

与此对应,浙商企业家禀赋的三个维度——非编码信息优势和创业知识的易流动性、不确定环境下的强行动力和高效率的小数据决策模式,共同形成了浙江人的“低受教育程度和高创业能力”现象。创业教育不同于一般的学历教育,创业知识的来源和流动亦异于其他编码知识。发现浙商的这一特点,对提高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创业创新能力有较大启示和现实意义。

但是,以“低学历、高效率”为特征的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阶段匹配性,在短缺经济和市场经济早期特别有效。基于隐性知识的个人直感决策效率较高但稳定性较差,在面对复杂问题和异动情境的时候,因为“小数据”的局限性和隐性知识的内生强化性,可能影响决策质量。在市场竞争进入到规范化、体系化的新阶段,浙商传统模式遭遇挑战,先发优势和先天优势开始削弱。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的浙商群体要继续保持竞争力的领先优势,需要在学习机制、知识结构、决策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机更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浙江省统计局课题组. 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的比较研究. 浙江经济, 2013;13:34-37
Zhejiang Provinci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Zhejiang and Other Coastal Provinces. Zhejiang Economy 13:34-37.
- 2 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0 浙江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解读.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1
The Sixth Census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Zhejiang Province. 2011. The 2010 Census, Interpretation of Main Data of 2010

- Population Census of Zhejia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3 叶明德,孙胜梅.“浙江现象”与人口素质,人口与经济,2004;2:32-38
Ye Mingde and Sun Shengmei. 2004. “Zhejiang Phenomenon” and Population Quality.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2: 32-38.
 - 4 陈丽华. 提高浙江人口素质刻不容缓. 浙江经济,2000;8:44-45
Chen Lihua. 2000. Improving Population Quality in Zhejiang is of Great Urgency. Zhejiang Economy 8: 44-45.
 - 5 陈立旭. 区域文化与经济发展——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 浙江社会科学,2005;3:3-12
Chen Lixu. 2005. Regional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3: 3-12.
 - 6 陈秀山,张若. 异质型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差距中的贡献研究. 经济学动态,2006;3:36-41
Chen Xiushan and Zhang Ruo. 2006.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Human Capital in Regional Ga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36-41.
 - 7 周文斌,论人力资源能力的区域异质性,中国工业经济,2007;10:1-9
Zhou Wenbin. 2007. A Study 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Human Resources Capacity.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10:1-9.
 - 8 林祥. 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核心能力的相关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5:86-88
Lin Xiang. 2002. The Correlation of Entrepreneur Capacity and Core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5:86-88.
 - 9 李志,郎福臣,张光富. 对我国“企业家能力”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重庆大学学报,2003;3:116-118
Li Zhi, Lang Fuchen and Zhang Guangfu. 2003.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i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3: 116-118.
 - 10 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著. 何晖,刘明兴译. 经济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 Translated by He Hui and Liu Mingxin. 2000. Economic Growth.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11 陈春霞. 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决策分析. 经济问题探索,2008;1:124-128
Chen Chunxia. 2008. Behavior Economics and Behavior Decision Analysis: A Literature Review.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1: 124-128.
 - 12 柏菊. 直觉决策研究综述与展望. 中国软科学,2008;5:140-146
Bai Ju. 2008. Review and Prospect of Intuitive Decision-making Research. China Soft Science 5:140-146.
 - 13 杨轶清. 企业家能力来源及其生成机制:基于浙商“低学历高效率”创业现象的实证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2009;11:26-30
Yang Yiqing. 2009. The Origin and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 Ability: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Zhejiang Merchants' “Low Qualification-High Efficiency”.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1: 26-30.
 - 14 杨轶清. 企业家能力与公司生命周期匹配——基于金融危机以来倒闭浙商的实证分析. 商业经济管理,2010;11:19-25
Yang Yiqing. 2010. How to Match Entrepreneur Ability with Corporate Life Cycle: Based on the Cases of Bankrupt Zhejiang Businessmen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Business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11:19-25.
 - 15 杨轶清. 金融危机以来浙江民企倒闭的原因和对策. 中国经济时报,2014-09-03
Yang Yiqing. 2014.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rporation Collapse in Zhejiang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China Economic Times, September 3rd.
 - 16 浙江省工商局. 浙江省市场主体信息报告(内部资料) 2007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ureau of Zhejiang Province. 2007. Information Report of Main Market Players in Zhejiang (Unpublished Report).

(责任编辑:宋 严 收稿时间:2014-12)